

# 美国与主要伊斯兰国家的关系:重塑与改造

高祖贵

当前,美国与主要伊斯兰国家的关系,既是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战略关系的政策体现,也是双方关系宏观架构的微观反映;既显示出这对战略关系的共性,也因地区和国别差异而具有各自特点。美国与“大中东”的土耳其、埃及、沙特、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苏丹、利比亚、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中亚 5 国和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关系,构成了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主要内容。其中,伊拉克、伊朗、沙特在伊斯兰世界具有独特而颇富代表性的地位,“9·11”事件后 3 国均成为美国打压甚至改造的现实和潜在的对象。它们与美国的关系,经历了冷战结束、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重大事件的冲击之后,在全球霸权的重塑与改造下发展和衍生着新的趋势。这些趋势将在一定程度上标识和决定着美国与整个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发展前景。

## 一、民主改造“大中东”

中东是伊斯兰世界的核心。美国对中东的战略和政策,集中体现了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利益和面临的威胁,以及对这个世界的战略和政策思想。所谓“大中东”(GME, Greater Middle East)与中东基本重叠,包括阿拉伯国家联盟的 22 个成员国以及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共 27 个国家。阿拉伯国家联盟横跨西亚和北非,有阿尔及利亚、阿联酋、阿曼、埃及、巴勒斯坦、巴林、吉布提、卡塔尔、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沙特、苏丹、索马里、突尼斯、叙利亚、也门、伊拉克、约旦、科摩罗等国。

(一)美国中东政策的演变。美国自 18 世纪初作为英国殖民地同中东发生纯商业关系开始,与中东已有近 300 年关系史。早在 18 世纪初,尚属英国殖民地的美国就同中东发生了“完全是商业性的”关

系。当时地跨欧、亚、非 3 洲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作为中东主要国家,与美国首先建立外交关系。19 世纪初美国与中东的经贸关系有所发展。19 世纪 20 年代随着美国传教士在中东进行宗教活动,美国文化开始通过它所创办的贝鲁特美国大学等机构渗入中东。20 世纪初美国中东政策的指导方针是:在不违背门罗主义的前提下,强调发展美国在中东的经济利益,重视中东的石油资源;积极加强文化渗透;保护美国的传教活动、医疗机构和慈善机构;保持与中东民族主义者的接触,支持他们的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企图利用奥斯曼帝国瓦解之机在中东建立势力范围,攫取中东的油田和战略要地,控制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居住的地区。由于国会最终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美国进入中东的企图暂时搁浅。但是,随着美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逐渐增大,它的石油垄断资本开始以伊拉克为突破口进入中东,以及它在土耳其和埃及等国的文化教育活动进一步发展,美国在中东的影响逐渐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通过在中东培植亲美势力和树立反殖民主义形象,使其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势力大规模进入中东,在沙特、伊朗、土耳其、黎巴嫩、叙利亚等国影响力大为发展。

二战后,美国与中东的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美国系统的中东政策由此开始,至今大致分为 3 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冷战时期(1945—1990 年)。在冷战格局下,美国透过抗苏的棱镜来观察和处理中东事务,其中东政策主要服从和服务于同苏联争霸的战略需要。二战后,登上资本主义盟主宝座的美国提出了它带有一定全球性的战略。当时美国为了对抗苏联,首要任务就是重建欧洲,稳定东地中海地区的局势,实施全球性的援助计划,承担联合国无力完成

的集体安全义务。整个冷战时期,中东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仅次于欧洲,美国中东政策的基本点是:把中东纳入美国的大战略,使之成为遏制和抗衡苏联的前沿阵地;与其他大国争夺石油资源的控制权,实现更多的现实和战略利益。美国历届政府所采取的具体政策措施尽管随国际环境的变化而不尽相同,但总体上均以此为核心目标而展开。

二战后美国的中东政策,以杜鲁门主义为发端,先后经历了艾森豪威尔主义、尼克松主义、卡特主义和里根主义等重要阶段,直至冷战后的老布什主义阶段。杜鲁门主义和艾森豪威尔主义在中东的政策目标主要有三点:排挤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在中东的传统势力并取而代之;压制二战后中东蓬勃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实现对苏联的遏制和包围。为此,它们采取了两个重大步骤,即支持以色列建国和筹组军事集团“巴格达条约组织”(1955年2月成立,1959年更名为“中央条约组织”,1969年停止活动)。尼克松政府则试图通过同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以及同苏联进行“谈判与缓和”,牵制苏联在中东的扩张势头。卡特主义提出“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构想,推动解决阿以冲突,促使埃及和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1978年9月由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签署)与和平条约(1979年3月),并通过对波斯湾国家实施或威胁实施制裁以防止苏联控制该地区。里根政府采取的中东政策则是:拉拢亲美的中东国家,形成协同抗苏的“战略共识”(Strategic Consensus);进一步倚重以色列;加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对利比亚等“挑战者”不惜发动低烈度战争和有限军事打击;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削弱苏联的影响。

第二阶段是冷战后时期(1990—2001年9月11日)。冷战结束尤其是海湾战争之后,美国在成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同时,也实现了独步中东的目标。美国透视中东的棱镜由对抗苏联转变为实现和维护全球霸权。为了这一战略目标,美国的中东政策改变了冷战时期利用和借助一批国家来应对甚至打压另一批国家的基本政策,转而采取在平衡和稳定地区局势的前提下逐步建立“新秩序”的政策。老布什政府力图构建“中东新秩序”,以及克林顿政府“西促

和平、东遏两伊”,均体现了“稳中求变”和巩固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的政策思路。老布什政府的“中东新秩序”具有四个方面的重要内容:1、以阿拉伯温和国家为依托,构建美国领导下的地区安全机制,包括:加强美国在波斯湾的军事存在;发展同温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调整里根时期十分密切的美以战略关系,保持适度距离和施加一定压力;打击伊斯兰激进势力,在伊拉克设立禁飞区和安全区,并借助联合国决议实施制裁等。2、控制军备发展,尤其是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3、以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以及领土换和平的原则为基础,推动美国主导下的阿以和平进程,努力创造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新机会。4、促进海湾国家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加强美国与中东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克林顿政府推行的“西促和平、东遏两伊”政策,即在西面的巴勒斯坦地区积极推进阿以和平进程,在东面的波斯湾地区同时对伊朗和伊拉克加以遏制。从就任到离职,推进中东和平一直是克林顿政府对外政策的重点之一。1993年克林顿一上台就公开表示,其政府把实现中东和平作为优先考虑的事项,将以“正式伙伴”的身份全面参与谈判,更加积极地推动阿以和平进程向前发展,并把1993年定为“和平年”。从1993年到2000年,克林顿政府先后促使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达成了《奥斯陆协议》、《希伯伦协议》等一系列和平协议,促使约以实现和平(1994年)。直至2000年卸任之前,克林顿政府还在戴维营举行了巴、以、美三方会谈,为中东和平进程做最后的努力。同时,克林顿政府在波斯湾实行严厉的“双重遏制”(Dual Containment)政策。1993年5月1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近东和南亚事务的总统特别助理马丁·因迪克(Martin Indyk)在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一次演讲中表示,美国有能力“既对抗伊拉克政权又对抗伊朗政权”,“不必依靠其中一方去对抗另一方”。<sup>①</sup>1994年克林顿总统在题为《参与和扩展战略》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正式宣布,美国“针对伊拉克和伊朗已经制定了新的同时遏制的

<sup>①</sup>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Special Report: Clinton Administration Policy Toward the Middle East”, *Policy Watch*, May 21, 1993.

战略”。<sup>①</sup>为此,美国改善并加强同阿拉伯温和国家的盟友关系;在海湾部署足以遏止或对任何侵略行为做出反应的军事力量;以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对伊朗和伊拉克进行孤立、制裁,甚至实施有限军事打击和支持其国内反对派发动政变等,遏制它们在地区范围内的影响,力图“以压促变”。

第三阶段是“9·11”事件以来的时期,也被称之为“后后冷战时期”(Post-Post-Cold War)。2001年小布什上台之初,美国对中东局势感到担忧。正如副总统切尼所说:“在9月11日前一个星期,我们担心在中东整个地区的力量——在那个地区,我们与沙特人、土耳其人和其他人站在一边。”<sup>②</sup>同时,布什政府对巴以和平采取超脱态度,甚至在需要的时候才介入,并开始对两伊酝酿实施“聪明制裁”(Smart Sanctions)。总体而言,从20世纪90年代直至2001年9月11日,美国在中东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似有两个基本点”:其一,首先以稳定为前提,并不刻意追求地区范围的剧烈变革;其二,在推动地区事务向有利于美国方面转变时,也以可控制、依靠现有力量、循序渐进等求稳的政策取向为主。例如,在推动阿以和平进程时,不仅接纳巴解组织作为一个主要谈判方,而且还把美国长期排斥的阿拉法特当作主要和平伙伴;在遏制伊朗和伊拉克时,以“稳中求变、以压促变”作为主要方向,而不以强力推翻和改变它们的政府作为直接目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9·11”事件之前数十年,美国一直以为主要阿拉伯盟友的政治安全与国内稳定是它推行其中东政策的重要依据,没有这些地区盟友的支持,其中东政策目标将难以实现。<sup>③</sup>“只要稳定和其他战略利益(即支持反对共产主义和保持稳定的能源输出)得到满足,美国就愿意支持维护现状并且不推动在伊斯兰国家内部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sup>④</sup>然而,“9·11”事件的强大冲击改变了这个基本的政策取向。“这种交易已经受到严重质疑。过去无论左翼自由的理想主义者还是右翼的新保守者,都在道德层面对此提出质疑。现在,随着这种老政策的代价变得日益明显,他们这些质疑以往政策的观点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sup>⑤</sup>人们开始盘算美国数十年中东政策所付出的代价。哈佛大学和乔治城大学研究中东能源经济学

的教授托马斯·斯陶弗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国中东政策的经济代价急剧增长并不断累积。现在能够确认的代价已经超过2.6万亿美元——是整个越南战争的4倍左右,所幸的是涉及伤亡的美国人员要少得多。在1973年之前,美国付出的代价不太大,收益却颇具吸引力,特别是就二战后大量的石油投资收益和不断增加的出口贸易而言更是如此。然而,自1973年阿以战争之后,这个平衡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成本急剧上升,经济利益消失,美国政策代价的总量迅速累计起来,在过去20—25年中高达2.6万亿美元还多。”<sup>⑥</sup>如果加上美国在与中东有关的冲突和暴力恐怖活动中遭受的人员生命损失(“9·11”事件就是典型例子),那代价就显得越发巨大。在这种舆论背景下,布什总统大力推行改造和重塑世界的战略,尤其是改变奉行数十年的中东政策,向伊斯兰世界(重点指向中东)扩展民主。“改变现状”成为美国实现其中东战略目标的途径,甚至“变化”本身也已成为其政策目标之一。

(二)布什政府民主改造“大中东”计划。“9·11”事件无疑对美国认识自身国际地位和世界的方式产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响。它不仅迫使美国重新审视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而且促使美国把注意力进一步聚焦到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内部问题可能产生的威胁,并逐步形成了一个向中东扩展自由、民主进而创造机遇、繁荣的完整计划。经历了“9·11”事件之后,美国人普遍认为,“奥萨玛·本·拉丹不是一种孤立现象,相反代表着阿拉伯世界的根本性失败”。他们意识到,中东局势已经对美国构成重大挑战:沙特作为最重要的战略性的石油供应国首次受到美国的质疑;美国与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的关系陷入冷战结束以来最紧张的状态;该地区国家内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变得越发严重;巴以暴力

① 梅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289页。

② Bob Woodward, *Bush at War*, Simon & Schuster, 2002, p. 90.

③ 东方晓:“美国的‘大中东倡议’:动机、目标与前景”,《亚非纵横》,2004年第3期,第8页。

④ P. W. Singer, “Time for the Hard Choices: The Dilemmas Facing U.S. Policy Towards the Islamic World”, *Working Paper No. 1*, September 2002,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⑤ Philip H. Gordon, “Bush’s Middle East Vision”, *Survival*, Vol. 45, No. 1, Spring 2003, p. 156.

⑥ Thomas R. Stauffer, “The Cost of Middle East Conflict, 1956—2002: What the U.S. Has Spent”,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 No. 1, Spring 2003, p. 45.

冲突升级不断加重阿拉伯世界的无助和失望感,进而继续加剧穆斯林对美国的仇恨;伊拉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严峻威胁。<sup>①</sup>这种现状和可能造成的代价已经变得令美国难以接受,使它强烈感到有加以改变的必要性。布什政府改造中东的计划核心是决意使用美国空前的实力,支持盟友,反对敌人,并设法促进民主和自由。这就意味着使用武力推翻伊拉克的独裁统治,在温和阿拉伯政权中逐步推进政治改革,并支持以色列,直至巴勒斯坦人认识到使用武力将一无所获,相反如果控制恐怖活动且同以色列的生存实现妥协就能生活在一个安全和得到承认的国度里。这个构想的第一步就是改变伊拉克政权,第二步是促使阿以实现和平,第三步也是最为困难的阶段,即促进该地区民主和自由发展。<sup>②</sup>这三个步骤相互关联,彼此交融,一体多面,其核心就是通过和平或非和平的方式扩展民主,进而实现重塑中东秩序、确保美国霸权与安全的战略目标。

1、民主改造“大中东”的思想与“中东自由前瞻战略”的提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认为,“在最根本的层面上,美国支持发展民主是一个原则性问题。这一直是而且仍将是作为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和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核心所在。美国之所以要帮助其他国家实现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是因为这些价值观是美国认为应该输出的生活方式,而是因为它们是普适的、不言自明的和不可剥夺的。美国之所以在国外促进民主也存在实际原因。这表明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互相补充的。道理非常简单,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上将比生活在一个独裁或混乱的政权组成的世界上更加繁荣昌盛。”“仅仅以权威为基础的稳定是虚幻的,最终也是不可能持续的。”“历史上,美国在整个穆斯林世界促进民主的努力常常处于停滞状态,并且不完整。”“现在我们站在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边缘。”<sup>③</sup>因此,美国应通过扩展民主来实现“大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

2002年9月,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的理查德·哈斯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年会上发表讲话,首次比较全面地阐述了通过扩展民主来改

变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进而重塑中东地区秩序的思想。他说:“‘9·11’事件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与伊斯兰世界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同时,它也帮助阿拉伯世界内部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自身社会上。最近发表的由一群著名阿拉伯学者和分析家撰写的《阿拉伯人力发展报告(2002)》,显示了这种新的自我反省。美国人和许多阿拉伯人一起把目光投向中东,都看到了在快速增长的人口重负下挣扎的社会;看到大多数社会错过了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自由化的机会,以及未能实行市场经济进而实现繁荣;还看到在这些社会里人们享有基本的政治和社会权利而竭尽全力。这种图景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思想,并且将越来越影响到我们对阿拉伯世界的政策。其影响比‘9·11’事件还大。我们意识到,狭隘地界定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并把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于获得能源或建立军事基地的权力,这种做法已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忽视许多社会内部引发动荡的问题,只会使疏远和绝望成倍地增长,并造成一种对恐怖主义的支持不断增长的社会气候。因此,作为一种替换办法,我们需要与阿拉伯世界确立一种更为广泛的新型关系,以便鼓励并使阿拉伯国家政权能够逐步解决自由赤字问题。在一些阿拉伯社会中,民主赤字已经变得越来越严重。我们需要平缓地重新制定政策,更加强调促进市场经济、教育改革和公民参与——男人和妇女同等——社会事务,并逐步加强民主制度和程序建设。这种重新定向不仅仅是‘理所当然之事’,它还具有战略意义。如果我们不能调整政策方向来解决这些国家缺少机遇以及由此导致的易于崩溃的问题,我们在阿拉伯世界的盟友将变得更加脆弱而不是更加强大,我们的利益也将因此受损。”<sup>④</sup>

如果说哈斯的讲话表明了美国以扩展民主来改造中东的政策思想,那么鲍威尔宣布对中东实施伙

<sup>①</sup> Vahan Zanyan, "Time for Making Historic Decisions in the Middle East",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 No. 1, Spring 2003, pp. 103—104.

<sup>②</sup> Philip H. Gordon, "Bush's Middle East Vision", *Survival*, Vol. 45, No. 1, Spring 2003, pp. 155—160.

<sup>③</sup> Richard N. Haass, "Toward a Greater Democracy in the Muslim Worl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03, pp. 138—140.

<sup>④</sup> Richard N. Haass, remarks t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02 Annual Conference, "Reflections a Year After September 11", September 13, 2002, <http://www.state.gov/s/p/rem/13442pf.htm>

伴关系计划则证明这种思想已经变成美国的现实政策。2002 年 12 月 12 日,国务卿鲍威尔在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发表演讲,正式提出题为《美国—中东伙伴关系倡议:为未来岁月构建希望》的扩展民主计划。该计划为美国重塑中东社会 and 地区秩序提出了初步框架,即“美国—中东伙伴关系倡议”(The U.S. - Middle East Partnership Initiative)。倡议由“一系列革新性项目和未来合作框架”组成,“是美国与中东之间的一座桥梁”。鲍威尔说:“美国长期致力于与中东人民共同努力,以改善他们的日常生活并帮助他们满怀希望地面对未来。伙伴关系倡议是这种努力的继续和深化,……也是我们在中东为人的尊严而努力的具体表现。我们首先拿出 2900 万美元来保证倡议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将同国会共同努力为下一个年度寻找更多的资金。这些资金将超过我们每年向阿拉伯世界提供的 10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我们的倡议建立在三根支柱之上。我们将同公共和私营组织一起,通过经济改革、商业投资和发展私营经济来增加就业,跨越就业鸿沟。我们将同中东各国领导人一道努力,通过加强公民社会、扩大政治参与和提高妇女发言权等各种项目来缩小自由鸿沟。我们还将与孩子的父母和教育者共同努力,通过创办更好的学校和为接受更高的教育提供更多机会,以便跨越知识的鸿沟。”为此,该倡议还计划建立“中东企业基金”(Enterprise Funds for the Middle East),为中小企业提供资本;同一些中东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增进双方经贸联系等。鲍威尔清楚地认识到,倡议是美国提出的“最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之一”;“美国应该对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中东真正发生根本变化所需要的时间,以及外来力量能够发挥作用的有限性等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同时,他也强调,要看到“美国并非从零开始”;中东人民自身也看到了问题所在,并有解决问题的强烈愿望,甚至已付诸行动。<sup>①</sup>

如果说国务卿的宣告尚不足以表明美国政府的政策选择,那总统的正式演讲应可代表美国的政策宣示。2003 年 2 月 26 日,布什在著名的新保守主义智囊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发表演讲,阐述了民主改造“大中东”与改

变萨达姆政权的问题。他说:“世界在传播民主价值观方面具有明确的利益,因为稳定和自由的国度不会滋生鼓动杀戮的意识形态。它们鼓励和平地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中东存在着渴望自由的迹象。阿拉伯知识分子已经呼吁阿拉伯政府解决‘自由鸿沟’(Freedom Gap)问题,以使它们的人民能够充分分享我们所处时代的进步。该地区的领导人提议制定新的阿拉伯联盟宪章。新宪章主张内部改革、更大程度的政治参与、经济开放和自由贸易。从摩洛哥到巴林乃至更为广泛的地区,一些国家正在为政治改革而采取切实步骤。伊拉克的新政权将为该地区其他国家充当备受瞩目且令人激动的民主范例。”他还指出:“被解放的伊拉克能够显示出自由使数百万人的生活充满希望和进步,并改造那个至关重要之地的力量。……美国在伊拉克取得成功还能为中东和平开启一个新的阶段,推动和平进程朝着建立真正民主的巴勒斯坦国的方向取得进展。……如果有关各方都抛弃痛苦、仇恨和暴力,并开始认真从事经济发展、政治改革与寻求和解,中东冲突的旧模式就可能被打破。”<sup>②</sup>

2003 年 11 月 6 日,布什在美国商会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成立 20 周年纪念大会上,进一步详细阐述了美国在伊拉克和中东扩展自由、民主的思想,并首次提出“中东自由前瞻战略”(A Forward Strategy of Freedom in the Middle East)。他说:“我们对民主的义务在中东也受到考验。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也必须是美国今后几十年的政策重点。在中东许多国家——而且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家——民主尚未生根发芽。于是问题产生了:难道中东地区的人民就与自由无缘?难道历史或文化注定数百万男女老幼只能生活在专制统治之下?难道唯独他们永远不知自由为何物,甚至永远无权在这个问题上做出选择?我本人不相信这种看法。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能力和权力拥有自由。……然而,中东地区如今面临严峻的挑战。用阿拉伯学者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的话来说,全球民主浪潮‘几乎没有触及阿拉伯

① Colin L. Powell, Secretary of State, “The U.S. - Middle East Partnership Initiative: Building Hope for the Years Ahead”,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2/15905pf.htm>

② President Discusses the Future of Iraq,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3/02/20030226-11.html>

国家’。他们还说:‘这种自由赤字损害了人的发展,是政治发展迟缓最令人痛苦的表现之一。’他们所描述的自由赤字给中东地区的人民乃至全世界带来了严重后果。在许多中东国家,贫困深重且不断扩大,妇女缺少权利并被剥夺就学机会。当世界向前迈进时,中东整个社会却处于停滞状态。这不是某种文化或某种宗教的失败,而是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失败。随着殖民地时代逝去,中东见证了许多军人独裁政权的建立。一些统治者吸取了社会主义学说,全面控制了政党、媒体和大专院校。他们先后同苏联阵营、国际恐怖主义结成同盟。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独裁者承诺要恢复国家尊严、找回往日的辉煌。但他们留下的却是迫害、镇压、残酷和毁坏。还有一些人和团体则通过在神学意义上带有恐怖色彩的意识形态在中东乃至更为广阔的地区赢得了影响力。他们的宗教语言背后隐藏的是获取绝对政治权力的野心。像塔利班这样的统治集团,它们所展示的表达宗教虔诚的方式,就是公开鞭笞妇女、残酷镇压一切异己以及支持武装起来并为滥杀无辜而训练的恐怖分子。塔利班承诺要实现宗教纯洁和国家尊严,相反却系统地摧毁了一个自豪且尚在运转的社会,并留下苦难和饥饿。许多中东国家的政府现在认识到,军事独裁和神权统治是一条笔直、平整却没有任何前途的道路。但是,一些政府仍然固守着中央集权的旧习惯。有的政府依旧害怕并压制独立的思想、创造力及个人进取心——这些品质都有助于打造一个强大而成功的社会。即使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它们也不尊重或开发自己最重要的资源,即工作和生活在自由之中的人民的才智与力量。中东国家的政府不应沉湎于过去的错误和指责他人,相反需要直面实际问题,为国民的真正利益而努力。优秀、能干的中东人民都应当拥有负责任的领导人。在很长一个时期,该地区许多人都一直是受害者和服从者——他们理应成为积极的公民。现在,中东和北非各国政府开始看到了变革的必要性。摩洛哥有了充满多样性的新议会;穆罕默德国王已敦促议会赋予妇女权利。他说,‘尽管我们伟大的宗教赋予代表国家半边天的妇女以尊严和公正,可如果她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权力遭受践踏,并饱受

不公正、暴力和边缘化之苦,那社会如何实现进步?’摩洛哥国王是对的,有了妇女的全面参与,穆斯林国家的前途才会变得更加美好。去年,巴林公民在将近30年中首次选出了自己的议会;阿曼已经使所有成年公民都享有投票权;卡塔尔颁布了新宪法;也门建立了多党政治制度;科威特直选产生了国民议会;约旦今年夏天举行了历史性的选举。前不久在阿拉伯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人们广泛支持政治多元化、法治和言论自由。这些都是中东令人鼓舞的民主迹象,它们预示着更为重大的变革即将来临。随着变革之风吹遍中东地区,掌权者应当扪心自问:他们将因抵制改革还是领导改革而为后人所记忆?在伊朗,对民主要求强烈而广泛,正如我们在今年10月所看到的,数千人集会欢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希林·伊巴迪(Shirin Ebadi)荣归故里。德黑兰政权必须认真听取伊朗人民的民主呼声,否则就会丧失它仅剩的一点合法性。对巴勒斯坦人民来说,通往独立、尊严和进步的唯一道路就是民主之路。阻挠和破坏民主改革、煽动仇恨、鼓动暴力的巴勒斯坦领导人,根本不是什么领导人,而是实现和平和巴勒斯坦人民取得成功的主要障碍。沙特阿拉伯政府朝着改革方向采取了一些初步措施,包括逐步实施选举的计划等。沙特政府可以通过让沙特人民在自己的社会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在该地区展示真正的领导地位。埃及这个伟大而自尊的国家已经在中东指明了通往和平的道路,现在应当指出中东通往民主的道路。该地区的民主先驱明白,民主不是完美的,也并非通往乌托邦之路,但它却是实现国家兴旺与尊严的唯一道路。在我们关注和鼓励该地区进行改革的同时,我们深知,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中东地区的代议制政府将反映它们自身的文化。它们不会、也不应当看起来像我们一样。民主国家可以是君主立宪制、联邦共和政制,或者是议会制。有效的民主制度总是需要时间来加以完善——就像我们自己所做的那样,我们在通向包容和公正的旅程上已经走了200年——这使得我们在其他国家处于这一旅程不同阶段的情况下能够保持耐心和理解。不过,有一些根本原则是所有成功的社会和所有文化都共通的。成功的社会应当约束国家的权力和军队的权力

——这样政府才能反映人民的意志而非精英阶层的意志。成功的社会应当保护自由,并且始终如一、不带偏见地实行法治而非有选择性地运用——即有选择性地运用法律来打击政敌。成功的社会应当为健康有益的民间机构——譬如政党、工会、独立的报纸和广播媒体等——留有空间。成功的社会应当保障宗教自由——即有权敬奉神灵而不必担心遭受迫害。成功的社会对经济进行私有化,并保护财产权。它们禁止和惩办官员腐败,为人民的医疗保障和教育投资。它们承认妇女的权利。此外,成功的社会不唆使自己的人民仇视和憎恨别人,而是唤起他们的希望。这些重要原则正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得以运用。…… 阿富汗虽然仍面临持续性的经济和安全挑战,但它将以一个自由、稳定的民主国家的面貌来迎接这些挑战。在伊拉克,美英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和伊拉克管理委员会也在共同努力打造一个民主国家——经过 30 年的暴政,这项工作实属不易。…… 这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任务——但它值得我们为之努力,值得我们做出牺牲,因为我们知道它事关重大。伊拉克民主的失败将助长世界各地恐怖分子的气焰,加重美国人民面临的威胁,粉碎该地区数百万人民的希望。伊拉克民主一定会成功。这一成功将向从大马士革到德黑兰的各国宣告,所有国家都可以实现自由。在中东地区的核心位置建立一个自由的伊拉克,将是全球民主革命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60 年来,西方国家一直宽恕和迁就中东地区缺乏自由的状况,这丝毫不能使我们感到安全——因为从长远来看,稳定不可能以自由为代价来换取。只要中东依旧处于自由凋零的状态,它就仍将是一个停滞不前、充满仇恨并且随时可能输出暴力的地区。随着可能对我们的国家和友邦造成灾难性危害的武器不断扩散,安于现状将是十分草率的行为。因此,美国采取一项崭新的政策,那就是在中东促进自由的前瞻战略。这个战略需要我们具有过去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坚忍不拔精神、力量和理想主义。其结果也将同以前一样。就像在欧洲、亚洲乃至世界所有地区一样,自由的推进都会带来和平。”<sup>①</sup>

在美国人特别是共和党人看来,“布什政府为‘大中东’提出的‘自由前瞻战略’,包括‘中东伙伴关

系倡议’和为全国民主基金会增加资金,都是改变这个地区的雄心勃勃而又符合实际的计划的良好开端。”<sup>②</sup>随后于 2003 年 11 月 11 日,布什在另一个著名的保守派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演讲时强调,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民主重建对整个中东地区民主的发展至关重要。他明确指出:“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民主重建如果失败,那注定这两个国家所有倡导自由的人都将入狱或处死,并将毁灭中东数百万人对民主的希望。民主在这两个国家失败会为恐怖网络提供新的基地,并使恐怖分子及其在全世界的同盟者感到振奋。民主在这两个国家失败还将使恐怖分子确信美国会在袭击之下退却,对美国更多的袭击肯定会接踵而至。恐怖分子援引贝鲁特和索马里的事例作为证据,认为美国将被迫逃跑。5 年前,一个恐怖分子曾说,一次袭击就能使美国在 24 小时之内撤退。这些恐怖分子错了。美国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完成历史使命。这两个国家的民主将取得成功,这种成功将成为自由发展史上伟大的里程碑。民主革命已经在全球展开,也终将在中东生根发芽。这个地区的停滞、封闭和愤怒将让位于进步和机遇。美国和世界将不受灾难性暴力活动的威胁,感到更加安全,因为恐怖不是自由力量使用的手段。”<sup>③</sup>

2003 年 11 月 19 日,布什访问英国时在白金汉宫的演讲中进一步强调,美国必须坚决地对过去持续多年的中东政策实行历史性的改变,不再容忍专制统治。他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放弃几十年来失败的中东政策。过去,美国一直愿意做出妥协,为了保持稳定而容忍压迫。长期的联系常常导致我们忽视当地统治集团的错误。然而,这种妥协并未带来稳定或使我们感到安全,只是为种种问题的滋长以及宣扬暴力的意识形态逐步生根赢得了时间。正如最近的历史所证明的,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压迫没有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后院就对它视而不见。我们再也不应仅仅因为一时的权宜考虑就想当然地以为暴政不

① President Bush Discusses Freedom in Iraq and Middle East,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United States Chamber of Commerce,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3/11/20031106-2.html>

② Chuck Hagel, a U.S. Senator from Nebraska, “A Republica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4, p. 70.

③ President Bush: Address to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November 11, 2003, <http://www.heritage.org/Press.Commentary/bush111103.cfm>



会造成损害。暴政对受害者来说决不可能是良性的,而我们伟大的民主制度就应该反对暴政,无论在何处发现都是如此。现在我们正在奉行一种不同的方针,即中东自由前瞻战略。我们将始终如一地挑战改革的敌人,勇敢地面对恐怖分子的同盟者。我们在这个地区的朋友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也将承担起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责任,完成我们业已拉开序幕的民主进程。……这种自由前瞻战略还必须运用于阿以冲突。”<sup>①</sup>

2004年1月20日,布什在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大中东”的概念,并向国会阐述了在“大中东”扩展民主的政策措施。他说:“只要中东依然是一个充满专制、绝望和愤怒的地区,它就会继续产生威胁美国和我们盟友安全的人及运动。因此,美国正在‘大中东’推行一项自由前瞻战略。……为了突破煽动仇恨的宣传壁垒,美国之音和其他广播机构正在增加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节目——而且,一个新的电视节目很快将开始为整个地区提供可靠的新闻和信息服务。我将向您们提出一项建议,即把全国民主捐赠基金的预算增加一倍,并使其把新的工作重点放在发展中东地区的自由选举、自由市场、自由舆论、自由工会上。当然,首先我们将完成阿富汗和伊拉克民主重建的历史性工作,以便这两个国家为其他国家指明道路,并帮助世界上这个麻烦不断的地区实现转型。”<sup>②</sup>1月24日,副总统切尼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上再次详细阐述“自由前瞻战略”,并5次论及“大中东”概念,呼吁民主国家为重塑“大中东”而共同努力。他在演讲中指出:“我们所实行的自由前瞻战略使我们有义务支持那些为整个大中东地区的改革而努力并做出牺牲的人。我们呼吁全世界奉行民主制度的友邦和同盟者,特别是欧洲的盟友,同我们共同做出努力。……鼓励扩展自由和民主是理所应当之事,也非常符合我们的集体自身利益。帮助‘大中东’的人民克服自由赤字是最终赢得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反恐战争的关键所在。这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伟大任务之一,需要一代人或更多代人的决心和资源。”<sup>③</sup>

2、“大中东倡议”的形成与发展。从“伙伴关系倡议”到“自由前瞻战略”再到“大中东”概念,上述一

系列战略和政策思想经过不断酝酿、整合、相互补充、发展和完善,逐步浓缩为“大中东倡议”(Greater Middle East Initiative)。2004年2月9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说,布什政府即将提出“野心勃勃的”“大中东倡议”,白宫和国务院官员已经开始同欧洲盟友讨论该计划。2月13日,总部设在伦敦的阿拉伯报纸《生活报》(AL Hayat)独家刊载了标题为“八国集团大中东伙伴关系”(G-8 Greater Middle East Partnership)的倡议草案。倡议草案认为,“大中东”地区对国际社会构成了独一无二的挑战和机遇;该地区存在的自由、知识和妇女权利三种严重“赤字”,直接威胁地区稳定和八国的共同利益;只要丧失政治和经济权利的人数不断增长,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国际犯罪和非法移民就会继续上升。改变这种趋势的唯一办法就是改革。“大中东”地区国家的领导人已经顺应改革的要求并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八国集团”应与主张改革的中东国家领导人结成长期伙伴关系,支持它们的改革努力,共同推进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根据美国的计划,八国应主要在三个方面帮助“大中东”国家:<sup>④</sup>

第一,促进民主和确立良好的治理,为各方面的发展构建一个框架。对于那些确实愿意举行自由、公正选举,并且已经宣布将在2004—2006年举行总统、议会或市政选举的国家,应该通过交流提供技术帮助,以建立或加强负责监督选举等事务的独立的选举委员会,以及进行选民登记和公民教育;通过议会交流和培训,特别是制订和执行法律以及进行司法改革方面的培训,加强议会在促进国家民主化建设中的作用;资助妇女培训机构,为有志于参与选举或建立并管理非政府组织(NGO)的妇女提供领导能力方面的培训,以增强妇女参与政治和民众事务的能力;美国、欧盟、联合国、世界银行应继续推进在一些中东国家业已启动的包括司法培训、司法管理和

<sup>①</sup> President Bush Discusses Iraq Policy at Whitehall Palace in London, November 19, 2003,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3/11/20031119-1.html>

<sup>②</sup> President Bush,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at United States Capitol, January 20, 2004,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4/01/20040120-7.html>

<sup>③</sup> Remarks by the Vice President to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January 24, 2004,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4/01/20040124-1.html>

<sup>④</sup> U. S. Working Paper For G-8 Sherpas, <http://www.daralhayat.net/actions/print2.php>



法律体系改革在内的法律和司法改革计划,同时将这些计划向中东各国社会基层扩展,从基础上树立社会正义,包括建立和资助一些司法援助中心,以帮助公民个人获得民事、刑事和伊斯兰教法方面的法律建议;为新闻专业的学生、教授以及新闻从业人员之间的交流提供资助和培训,促使中东各国政府增进透明度和反腐败力度,鼓励各国政府允许人权和舆论领域的非政府组织不受到伤害或限制地展开活动,并向这些公民社团组织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最终培育和促进独立的媒体和社会舆论力量发展。

第二,建立知识型社会,使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人成为各种发展计划的执行者和代理人。倡议认为,大中东虽然曾经是科学发展的摇篮,但如今已经滞后于以知识为导向的世界发展趋势,严重影响其发展前景。特别是公共资金严重不足、人口增长产生巨大的教育需求以及女性缺少受教育机会等原因,给大中东国家的基础教育造成严重问题。因此,“八国集团”应该制定和实施促进大中东基础教育的计划,包括:继续推行联合国 2003 年开始的扫除文盲的 10 年计划,并把重点放在下一个 10 年内培养有文化的一代人这个目标上,到 2010 年减少该地区一半文盲;创建或扩大针对妇女的教师培训机构,培养更多的女教师,以便加强对女孩的基础教育,提高她们的识字率,力争到 2008 年培训 10 万女教师;翻译哲学、文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领域的西方经典著作,并捐赠给该地区各类学校和图书馆,以作为基本教材;提供资助和呼吁私营机构予以帮助,将约旦等国业已实行的采用新教学技术和教学方法的“创新式学校”(Discovery Schools)模式向其他国家推广;由“美国—中东伙伴关系倡议”发起和资助“中东教育改革峰会”,使来自中东和美国、欧盟的致力于教育改革的公共和私营教育机构及社会团体的精英展开交流,讨论缩小该地区“教育赤字”(Education Deficit)等问题;由公共和私营机构联合为整个大中东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学校提供扩大使用计算机的途径,帮助缩小该地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初期的重点应放在互联网使用最少的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也门、叙利亚、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埃及、摩洛哥等国;在“八国集团”的商业学校和该地区教育

机构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主办和资助一些正式的长期项目和短期课程教育等,就商业发展计划或市场营销战略的制订等具体问题培训。

第三,扩大经济发展机遇,使企业成为社会发展引擎。“大中东”需要进行类似于中东欧国家所实行的经济转型,才能改变贫穷落后状态。其中关键是激发作为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的主要引擎的私营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潜力。企业家阶层也是促进民主和自由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倡议草案主张“八国集团”共同提供资金支持,帮助该地区提高经济效益,包括:向当地现有的小型金融机构提供资金,预计 5 年内提供 4—5 亿美元的贷款就能帮助 120 万中小企业主摆脱贫困;成立由八国私营机构精英共同管理的“大中东金融公司”(Greater Middle East Finance Corporation),按照“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的模式运营,向大中型企业提供专业帮助,以促进地区商业一体化;按照“欧洲重建和开发银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的模式建立“大中东发展银行”(Greater Middle East Development Bank),着重为该地区发展教育、医疗保障和基础设施筹集资金,并提供技术和知识援助。同时,倡议主张促进该地区的金融改革,使其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为此,“八国集团”应与当地金融机构的领导人合作,并提供技术和专业知识帮助,以促进和扩大该地区金融服务自由化。重点是:推行削弱国家控制的金融机构地位的改革计划,消除阻碍国际金融交易的壁垒,实现银行服务的现代化,引进、提升和扩大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工具,建立鼓励金融自由化发展的监管机构等。此外,倡议草案主张消除该地区非关税壁垒,建立贸易中心以促进区域内贸易,支持大中东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促进该地区与区域外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发展,建立专门的“商业孵化区”(Business Incubator Zones)以鼓励地区范围内在产品设计、生产和营销等方面的合作。目前,世界贸易组织已经为申请加入的阿尔及利亚、黎巴嫩、沙特、也门设立工作组;阿富汗、伊朗、利比亚、叙利亚的申请尚未审议;伊拉克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观察员。最后,倡议草案还提出建立“大中东发展机遇论坛”

(Greater Middle East Economic Opportunity Forums), 为“八国集团”和“大中东”的高官及其他精英共同讨论经济改革问题提供舞台。论坛可依照松散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模式进行。

美国国内和国际舆论将这项冷战后美国最庞大的外交计划与冷战时期的《赫尔辛基协议》(Helsinki Accords)相提并论。1975年,该协议由包括美国、苏联以及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在内的35个国家签署。起初协议的宗旨是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存在的边界纠纷,并为解决其他分歧建立一个机制。但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人权和基本自由等问题却成为关键内容,这就为西方鼓动和保护苏联阵营的持不同政见者的组织,并敦促苏联和中东欧国家扩大公民自由提供了施加影响的渠道。学术界尤其是保守派普遍认为该协议加速了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堪称二战后签署的影响力最大的协议之一。正如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所指出:“有一种看法认为《赫尔辛基协议》起到了使欧洲统一的作用,并在促使苏联垮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大中东倡议’也将破坏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吸引力。”然而,不同于《赫尔辛基协议》的是,“大中东倡议”设法避免创建一些委员会和机制来严格监督倡议的进展,并且力图避免强加于伊斯兰世界的印象。相反,“倡议只是表明‘我们在大中东地区听到了想要民主和改革的呼声,这就是我们所能给予的支持’”。“这是美国对中东政策的全面改变”,是布什政府将改造整个地区的政策机制化的结果。<sup>①</sup>事实上,倡议囊括了阿富汗重建、伊拉克重建、巴以冲突、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利比亚问题等,甚至涉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个重要伊斯兰国家的未来走向。这等于把美国当前和未来在“大中东”面临的重大问题都包括进来,是布什政府对“大中东”的基本战略和政策。作为倡议需要借助的重要方面,欧盟普遍认为“这是值得进行的努力”,但强调推动解决以巴冲突和“让有关穆斯林国家感到自己是这一进程的主人”的重要性。一位多次在白宫参与讨论该倡议的欧洲大使说:“很难想象一项使大中东转型和实现现代化或者为该地区带来民主的计划如何能够发挥作用,除非您还能在该地区的核心冲突上取得进展。如果我们把阿以问题搁置起来,这项计划就不会起作用。”<sup>②</sup>阿拉伯国

家作为倡议实施的对象,对美国的意图持怀疑态度并反对外部强加的改革计划。阿盟秘书长穆萨指出:“阿拉伯世界想在巴勒斯坦问题的处理上看到一些诚意,这样它才能相信美国提出的倡议不是出自对以色列盲目的偏袒。”<sup>③</sup>

2004年6月9日,布什政府在美国佐治亚州萨凡纳小城附近的海岛(Sea Island)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正式提出“大中东倡议”并赢得支持。土耳其、伊拉克、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巴林、约旦、也门、摩洛哥等“大中东”国家领导人应邀出席会议。经过磋商,美国对该倡议加以修改,包括将“大中东”改为“泛中东和北非”,把倡议的实施范围限制于阿拉伯国家,强调考虑它们的国情和发挥其主体作用,进一步淡化外部强加之意;重申巴以和平进程的重要性,承诺继续推动解决阿以冲突和伊拉克重建等;让倡导改革的私营团体更多参与进来,以增添对大中东地区的“影响渠道”;并为实施倡议制定了更为详尽而具体的措施。根据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发表的声明《与泛中东—北非地区的进步和共同未来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Progress and a Common Future with the Region of the Broader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八国集团将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与该地区的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代表进行真正的合作,以增进自由、民主和共同繁荣。为此,八国集团将遵循8条原则,即以加强国际社会对实现泛中东和北非的和平与稳定的义务为根本;以解决持续已久的激烈争端特别是以巴冲突为实现地区进步的重要因素;地区冲突决非实行改革的障碍,改革实际上还可能对解决冲突产生重要促进作用;恢复伊拉克的和平与稳定对数百万伊拉克人的福祉和该地区的稳定至关重要;成功改革取决于该地区的国家,变革不应也不可能从外部强加;尊重各国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八国集团的介入必须符合当地情况并以当地人民为主导,每个社会将决定各自变革的步调和范围,独特性虽然重要但不能成为妨碍改革的理由;(转第15页)

① Robin Wright and Glenn Kessler, "Bush Aims for 'Greater Mideast' Plan: Democracy Initiative to Be Aired at G-8 Talks",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9, 2004.

② Glenn Kessler and Robin Wright, "Arabs and Europeans Question 'Greater Middle East' Plan",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2, 2004.

③ Glenn Kessler and Robin Wright, "Arabs and Europeans Question 'Greater Middle East' Plan",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2, 2004.

入政治生活,并成为新融合的“新右翼”的组成部分。在当时出现的一则著名的声明《福音派教徒与天主教徒联合起来》中,他们呼唤“公民社会的正常秩序”,声称“政治、法律和文化必须由道德真理来保障”,“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自由和公正的,而高尚品德须由宗教来保障”。宗教保守派认为美国社会中的道德败坏源于自由主义的左倾和世俗的人文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经由媒体传播的大众文化,主张恢复宗教在国家中的地位来解决上述问题。右翼基督教派曾先后在大选中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卡特与共和党候选人里根。在美国现任总统布什执政期间,右翼基督教极端主义在政府部门中的势力越来越大,并影响到布什政府的内外政策。

(三)外交保守派。美国的外交保守派可以分为传统保守派与新保守派。<sup>①</sup>其中传统保守派认为:只有与美国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问题才构成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外交与国防资源应致力于应对国家

安全的威胁,而非冲突地区的国家建设;试图向世界推广美国的民主与人权是徒劳和危险的行为。传统保守派又被称为“现实主义保守派”。新保守派认为在处理与美国国家安全相关问题时,同时应向世界推广美国价值,只有更多的国家接受美国的民主自由观念,才能保证世界及美国的安全。新保守派又被称为“理想主义保守派”。另外一种分类是将外交保守主义分为“国际主义保守派”与“孤立主义保守派”两类。国际主义保守派主张美国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致力于促进自由的市场经济以及全球一体化,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共和党人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孤立主义保守派只关心自身利益与安全,不愿意介入国际事务,企图使美国孤立于世,其代表人士是美国改革党领袖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

<sup>①</sup> 参见郑文通:“伊拉克战争与美国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载《视角》第3卷,第2期,2003年4月23日。

(接第10页)该地区的政府、企业领导人和公民团体都可能得到支持,成为全面伙伴;为了该地区人民的利益而支持改革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八国集团和整个地区做出一代人的努力。这个伙伴关系的核心是建立一个“为了未来论坛”(Forum for the Future),以使八国集团支持改革的努力植根于公开和持久的对话基础之上。论坛将提供一个部长级框架,以便八国集团和该地区国家的外交、经济和其他部门的部长就改革问题展开持续讨论,以及企业和公民社会领导人参与一系列的平行对话。论坛将充当听取该地区需要的渠道,以确保八国集团的努力满足当地的关切。此外,该伙伴关系还将注意同“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The Euro—Mediterranean Partnership)即“巴塞罗那进程”(Barcelona Process)、“美国—中东伙伴关系倡议”(The U. S. Middle East Partnership Initiative)、“日本—阿拉伯对话倡议”(The Japan—Arab Dialogue Initiative)等双边和多边计划相配合,与重建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努力相协调,最终加强在整个地区的持续介入。<sup>①</sup>与联合声明相配套,八国集团领导人同时制定了题为《八国集团支持改革的计划》(G-8 Plan of Support for Reform),为支持“泛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改革提出了详细而具体的政策措施。

除建立“为了未来论坛”外,该计划呼吁建立小型金融机构,为200多万潜在的企业家提供资金支持;确立未来10年使该地区文盲率下降一半的目标,到2009年之前为该地区培训10万教师;建立“民主援助对话”(Democracy Assistance Dialogue)机制,交流实行民主化的信息和经验教训;在“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之下创建“私营企业发展部”(Private Enterprise Development Facility),以支持改善该地区企业和投资的努力;创建一个“基金网络”(Network of Funds),联合研发和金融机构的代表以整合机制建设的资源;组建由企业领导人组成的“投资工作组”(Task Force on Investment),发现和解决有关贸易、投资的问题,等等。<sup>②</sup>之后,布什政府在6月26日爱尔兰主办的美国—欧盟首脑会议,以及28—29日土耳其主办的北约首脑会议上,再度与盟国商讨改造“大中东”的问题,促使欧盟和北约表示愿意为实施该倡议提供多种形式的帮助。(待续)○

<sup>①</sup> “Partnership for Progress and a Common Future with the Region of the Broader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June 9, 2004, Sea Island, Georgia,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2004/06/20040609-30.html>

<sup>②</sup> “G-8 Plan of Support for Reform”, June 9, 2004, Sea Island, Georgia, <http://usinfo.state.gov/ei/Archive/2004/June/09-808427.html>